



清华国学丛书

蒙元制度与 政治文化

姚大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清华国学丛书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姚大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清华国学丛书)

ISBN 978-7-301-18705-0

I. ①蒙… II. ①姚…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335 号

书 名: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著作责任者: 姚大力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705-0/K · 07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15.625 印张 363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

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目录

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1

- 一 起源 1
- 二 关于千户序列的研究 10
- 三 内部结构 31
- 四 千户百户内部的社会关系 83
- 五 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93

从汗到合罕

- 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119

论蒙元王朝的皇权 139

- 一 引言 139
- 二 双重身份:皇帝与大汗 143
- 三 皇权与怯薛制 152
-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166
- 五 蒙元皇权与中国专制君权的演变 174

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

- 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195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219
一 元朝设科取士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及其失败	219
二 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	230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245
四 略论元朝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269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	279
一 弁言	279
二 蒙古国时期中原汉地的刑法	281
三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	286
四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续)	295
五 元朝刑法体系的确立	302
六 元朝刑法体系确立过程的特点和评价	309
附论:“法司”的含义	315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	
——附论元初的刑政	322
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	340
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366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390
乃颜之乱杂考	403
一 斡赤斤的份地	404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406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409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415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420
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420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423
三 乃颜的世系	426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431
五 “按只斛”的蒙古原名	434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437
“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460
一 对“混一图”之陆海轮廓线的分析	463
二 “混一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476

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一 起 源

游牧社会中十进位军事编制的历史传统

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①。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②。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③。这个属国千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后汉书》卷33,《郡国志》五。《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严师古注:“千长者,千人之长。”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2

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①。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②。这是十分可能的。

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③。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④。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⑤,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⑥,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页768,胡三省注。

② 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大阪,1953年,页52。

③ 《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传》注引《英雄记》所载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跋文》。

④ 《北史》卷98,《蠕蠕传》。

⑤ 《宋书》卷95,《索虏传》。

⑥ 内田吟风以为他们是屠各部落中的其他贵显姓氏,证据似嫌不足。见内田上引书,页75。

少,为高下次第焉”^①。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②。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③。

从匈奴那儿接受十进位编制的乌丸人,当时还刚刚越出部落大人“无世业相继”,诸部落“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的阶段^④。十进位编制在乌丸部落社会中的功能,亦应大致与匈奴社会相类似。

如上所述,在社会组织还大部分保留着氏族部落血缘外壳的游牧人中间,十进位军事编制,只是他们为应付“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需要,以原有氏族部落为单位,按“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的原则编组和调度军队时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组织,也是以其社会分划为基础,即按氏族、胞族来编制的。他写道:“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各有区别”^⑤。由此可知,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社会里,同样存在过与氏族外壳并存、相对于

① 《后汉书》卷119,《匈奴列传》。

② 《晋书》卷97,《北狄传》。

③ 见内田上引书,页38。

④ 《后汉书》卷120,《乌桓传》。

⑤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纯等译,北京,1981年,页199、115。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地位的军事性质的编制。

汉文史料提到过蒙古克烈部中的百户组织^①，但由于记载太过简略，不克详考。关于12世纪末叶以后蒙古部落中的千户百户，史料略微充分一点。忽图拉的儿子阿勒坦，亦称按弹折温。伯希和将“折温”的称号，与雪干部的速客该者温(sūkegei je'ün)、亦勒都儿斤部的阿儿孩者温(harqai jün)两人的称号相比拟，认为都是蒙文je'ün的音译，意为左翼^②。看来此处的“折温”很难与蒙文ja'un(译言百，百户)一词相联系。但是，至少阿勒坦的兄长拙赤手下，当时是有千户的军事编制的。拉施都丁告诉我们，忽图拉汗的长子拙赤，“曾带若干自己的千人队(hazārah)同成吉思汗联合，被编入他的军队”^③。

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时，拙赤所部在帖木真的阵营中自成一翼。在叙述十三翼之战时，拉施都丁又一次提到，站在帖木真一边的各部聚集起来之后，“遂按万人队、千人队、百人队和十人队来确定他们的人数(shumārah īshān bi-tūmān wa hazārah wa šadah wa dahah mu'yyan gardānīd)”，组编为十三个古列延(圈子)^④。这些“千人队”、“百人队”等等，似乎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来统计和调配兵力时

① 克烈部人也先不花曾祖，早年“以百夫长事王可汗”。见姚燧：《答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13。也先不花传见《元史》卷134。

② 见《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120节；拉施都丁：《史集》，余大钧等汉译本（据俄译本转译），第1卷第1分册，页286。并参见P. 伯希和及L. 韩伯诗：《圣武亲征录译注》卷1，莱顿，1951年，页129。

③ 《史集》，余大钧等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41。

④ 拉施都丁：《史集》，巴赫曼·卡里弥博士刊本(Bahman Karīmī, Jāmi' al-Tawārīkh, Tehran, 1338[1959年])，页243。汉译本此处译作“按万、千、百人点数”，兹据以复按波斯文原文，改译如是。蒙古时代的波斯文史料有区别地用hazār和hazarūh两个词来翻译蒙语minqan的“一千”和“千户”这两个意思。同样地，它也分别用šad、dah和šadah、dahah两套词汇来翻译蒙文的ja'un(百，百户)和harban(十，十户)。

的一种辅助性制度设置。

上述记载表明,在12世纪末叶的蒙古人中间,附属于氏族部落结构的十进位编制之特殊军事功能,与匈奴、乌丸、柔然时代相比,似乎还很少质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得晚至12世纪末才出现于蒙古社会。不过是史料的缺乏阻止着我们更往前去追寻它的踪迹而已。

这种情况,到13世纪初叶,发生了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

癸亥、甲子年间的千户百户建制

癸亥、甲子年(1203、1204年)之际,帖木真在大举进攻乃蛮前夕,对他统领下的蒙古部众进行了一次整编,“数目的行共数着,千那里千做着,千的官人,百的官人,十的官人那里委付了”^①。与组编千户百户同时,他还“宣布号令”,“订立了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委派扯儿必(cherbi)官人,建立了一千五百余人组成的亲卫军。从这些措置来看,拉施都丁说帖木真在此时登临汗位,并不是无根之谈;虽然建号“成吉思汗”一事,并不发生在帖木真这次称汗之时^②。然而,当时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很可能被随即发生的克服强敌乃蛮的生死搏斗和辉煌战绩大大地冲淡了,以致东西史料对此大都载之过简,语焉不详。事实上,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次寻常的战前动员或纯军事部署。上述诸项创制,为1206年蒙古国家的正式确立,预先树立起一个基本的构架。

那么,就千户百户制度而言,癸亥甲子间的建置,是否已经蕴含着1206年定制的主要特征,从而相对于游牧社会中在此以前的十进

① 《元朝秘史》第191节旁译。

②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185、345;《元朝秘史》第191节。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位军事编制显示出阶段性的区别呢？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通过零碎和片断的记载来导出我们的推断。

就在乃蛮太阳汗部败亡的那年冬天，过去曾受其控制的蔑儿乞部的分支兀洼思蔑儿乞人向帖木真献女求和。《圣武亲征录》称，帖木真“为彼力弱，散置军中”。从《史集》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所谓力弱，是指他们缺少战骑头匹，无力从征出战；所谓散置军中，就是将他们划分为百户（*bar şadaha bakhsh kardand*），委派长官，分置于蒙古奥鲁中间^①。对这批一时不用以投入战争的归降部众，亦按千户百户组编，似乎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千户百户制正在取代氏族部落外壳的诸种功能，而向着蒙古草原上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转变。

癸亥甲子间所建千户、百户的首领们，大都在1206年建国时重新获得确认，并且往往以较后那一次任命传诸史文，遂使其建国前的事迹反而淹没不详了。不过，终究还能找到若干迹象，使我们得以探究前后两次千户百户建置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迹象之一，与后来的伐宋统帅伯颜的祖先有关。据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②，伯颜曾祖父术律哥图，“以其兵从太祖讨定诸部，尝为千夫长”，后来又以子阿剌（即伯颜祖父）“嗣官”。核以《元朝秘史》第202节，建国时所授千户那颜中，只有阿剌黑（*Alaq*，阿剌为其异译）而无术律哥图。是知巴邻部的这个千户，当成立于癸亥、甲子年间，以术律哥图为那颜；到1206年，则由前者的儿子阿剌黑继

①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206。

② 《国朝文类》卷24。

任千户长。

另一例子,是蒙古早期的名将速不台。他“初以质子入侍,继为百夫长”^①,而在1206年建国时,又出任千户长^②。可见他由质子出领百户,当是癸亥、甲子年间事。

速不台的兄长忽鲁浑拔都,曾以“哈必赤百户事太祖皇帝”。“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不及禄而卒”^③。忽鲁浑何时授百户长,无以确考。《元史》编者据黄潛、王恽所撰碑文写成的速不台、雪不台两传,把它置于1202年阔亦坛之战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他们将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理解为继袭忽鲁浑的禄位,则肯定是一种误会。在近来研究中,仍有学者照引本传史文,并把“中原既定”解释为成吉思汗之统一漠北诸部。于是,忽鲁浑之死以及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都被系于1206年或稍前。据此,他们进而怀疑《元朝秘史》关于速不台在1206年受封为千户那颜的记载失实。

其实,“继为”之“继”,在这里不一定有承袭的意思。按黄潛碑文,忽鲁浑子哈丹,哈丹子也速带儿,后者生于1254年。如果忽鲁浑果真死于1205或1206年,那么其子哈丹的出生,至迟不得晚于次年。如是,则也速带儿出生时,他父亲哈丹的年龄必得在四十八岁以上,这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像通常那样理解为窝阔台灭金后的著名的丙申分封,则一切勉强之处,便都怡然冰释了。丙申年受封的“左手九千户”中,有“合丹大息千户”^④。大息应即太师的异译。者勒篋后人中拥有太师称

① 王恽:《元良氏先庙碑铭》,《秋涧集》卷50。

② 《元朝秘史》第202节。

③ 黄潛:《也速带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④ 《元史》卷95,《食货志》三。

蒙
元
制
度
与
政
治
文
化

号的不止一人。所以,这个“合丹大息”很可能就是忽鲁浑之子哈丹。是则忽鲁浑死后,确有人承袭了他的爵禄。不过这个人并不是当时早已威震东西的速不台,而是忽鲁浑自己的儿子哈丹;这件事也不是发生在1206年,而是在此后大约三十年。

再一个例子是不鲁罕罕割。《元史》卷135《忽林失传》:“曾祖不鲁罕罕割,事太祖,从平诸国,充八鲁刺思千户,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以功升万户”。按:纳忽昆山之战击败乃蛮后,“札木合一同住来的每札答兰、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泰亦赤兀惕、翁吉刺惕等那里也投入了”^①。忽林失传文中所谓“与太赤温等战”,应指是役而言。不鲁罕因功升任万户一事,无疑还要在以后。而他初授八鲁刺思千户,无论如何总是在最后平服泰赤兀部的纳忽昆山战役之前。因而此事不可能晚至1206年,亦当为癸亥甲子年间事。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讨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两点基本上可以确认。首先,大漠南北草原游牧社会中的十进位军事编制的传统,同早期蒙古社会的千人队、百人队组织之间,并且通过后者又与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编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其次,癸亥、甲子年间的建置,又是传统的十进位军事编制就它的内涵和它的功能而言发生重大变化的真正转折点。

蒙古千户百户与金制的关系

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女真人确实在蒙古之前,就已成功地把原来附属于氏族部落外壳的“行军”建制即猛安谋克制,发展成为

^① 《元朝秘史》第196节旁译。